



澳门文学编年史

①

朱寿桐 主编
张建华 编撰



Macau Literature Chronicle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澳门文学编年史

①

朱寿桐 主编
张建华 编撰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澳门文学编年史. 1 / 朱寿桐主编 ; 张建华编撰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9. 12
ISBN 978-7-5360-9128-3

I. ①澳… II. ①朱… ②张… III. ①地方文学史—
编年史—澳门—1920-1949 IV. ①I209.9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1201号

出 版 人：肖延兵
责任编辑：黎 萍 蔡 宇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吴冠曼

书 名	澳门文学编年史. 1 AOMEN WENXUE BIANNIANSHI 1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32 2 插页
字 数	1,885,000 字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00.00 元 (1—5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编者简介

朱寿桐 文学博士，澳门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代主任，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澳门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海外暨港澳台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在澳门文学文化研究方面出版过《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等著作。

张建华 文学博士，广州大学原教授、硕士生导师。2013 年从广州大学退休，同年被广东培正学院聘为全职教授至今。出版个人学术著作 4 部，与人合著学术著作 3 部，高校教材 2 部。发表学术论文 80 篇（其中有 30 篇发表于核心期刊）。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 3 项。1997 年获教育部曾宪梓奖三等奖。2013 年获广州市人民政府“终身教育奖”。

总 序

一、澳门文学

澳门文学概念的形成虽然只有30年的历史，但澳门文学却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代。在澳门从事文学写作、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自然非常感激“澳门文学”概念被澳门内外所广泛接受这样一个学术事实。“澳门文学”概念，甚至其包含的“形象”得到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的普遍承认，确实扩大了澳门的文学影响，明确了澳门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对象和基本属性，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汉语新文学（实际上是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在内的当代世界华文文学）的既定框架，至少，原已在中国内地约定俗成的“港台文学”或“台港文学”被正式界定并表述为“港澳台文学”或“台港澳文学”。与此同时，提出“澳门文学”概念的那篇发言也就成了澳门文学乃至文化历史发展环节的一个标志。

然而，澳门文学概念既可能意味着澳门文学“独立”乃至崭露头角的强烈信号，也可能意味着澳门文学界自我封闭、自我设限的理论借口：一切以澳门特色为寄托，以澳门接受为满足。如果是这样，澳门文学的被突出未必就是一件好事。要保证澳门文学概念在正常模态中使用，需要我们从更加宏观也更加科学的澳门学的学术框架中审视澳门文学。

历史的勇气在于对有勇气的创见勇于承认。“澳门文学”“澳门文学形象”概念及其所具有的文化史意义应该得到充分的评价。其实，毋庸讳言，在“澳门文学”概念正式提出之前，“澳门文学”作为词语早就得到了甚至较为普遍的运用：既然澳门有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家的写作及与此相关的文学运作，在表述这些现象的时候，如果想到地域的框定，“澳门文学”作为词语几乎就会脱口而出。因此，与其说那篇著名发言的贡献是提出了“澳门文学”这一词语，不如说是确立并阐述了“澳门文学”的概念，以及与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澳门文学形象”这一关键性命题。显然，“澳门文学”作为一般词语和作为学术概念之间

有很大的差别：概念的内涵一般重于概念的外延，而一般词语则较多地注重外延的清晰度。“澳门文学”概念的提出者将“澳门文学形象”的考虑引入概念的论证，有效地充实了“澳门文学”概念的内涵。这样的内涵也应该是澳门学的当然内涵。

澳门学一般偏重于澳门历史、经济、社会以及相关典籍的研究，似乎与文学关系不大。其实不然。一种学问必然将其所覆盖的文化寓含于其中，而文学是文化的集中表现。如果澳门学的当然内容必然包含澳门文化，那作为澳门文化的集中体现的澳门文学也应是澳门学的当然内容。

作为“澳门文学”概念内涵之一的“澳门文学形象”，其实暗含着澳门文学的特色，同时也暗含着澳门文化的基本内涵，因而也应成为澳门学的当然内容。作为一种区域文学，澳门文学需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凸显自己的特色，以便在汉语新文学世界形成自己的影响。但值得深思的是，如果不立足于在汉语新文学世界中形成自己的影响，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只是强调自身的区域性定位，在特色和形象中自给自足、我行我素地运行，则作为概念的“澳门文学”很可能成为作为实体的澳门文学的一种牵累。

理论的游戏同任何一种人生游戏一样，它之所以成立，在于它拥有一种通常公平的潜在规则。在理论探讨方面，概念的产生及其影响的形成往往是相当成功的操作结果，不过同时会产生各种可能的纷争，甚至直接造成对于主体的牵累。这样的牵累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某种声名之累。在文学艺术及其学术领域常言说的“声名之累”，是指具有相当贡献和影响的创造主体，在被冠以一定的名衔和称誉之后，不是为这些声名所鼓舞和激励，反而是为之所束缚，所规约，从而削弱了、钝化了，乃至消颓了创造的热忱甚至才能，终至于回归庸常。“澳门文学”作为惯用词语其实只是框定了文学的地域范围，不妨也凸现出这一区域文学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特色，例如地方色彩之类。倘若作为一种凜然、严正的概念加以过于严肃的运用，甚至作为一种文化招摇的标签加以不无炫耀地对待，或者作为一种自甘边缘的借口以做不思进取的固守，最后可能导致严重的自我设限，导致澳门文学总体创作力趋减。

这样的判断在理论层面展开，不免带着某种主观推衍的成分，但并非危言耸

听，也不属于杞人忧天。“澳门文学”作为概念、标签，在不当的理解中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消极观念的借口，从而在上述逻辑关系中对澳门的文学构成理论的牵累和实际的负面影响——必须放在“澳门学”的整体思考和把握中，方能避免种种理论牵累。

在文学传播的传统意义上，澳门以高度自由的发表环境，强有力的政府或社团支持，以及文学写作者在自然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对高，营造了一派充满自然意味的文学生态，并造就了一方引人注目的文学热土。除了现代网络媒体构成的传播空间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当代文学生态是这样活跃而自由：手段高超的文学写作者与锋芒初露的文学自习者经常一起出现在各种媒体，堪称优秀的文学作品与相对粗糙的文学习作也有较多机会不期而遇。澳门显然不乏文学才士，但对有志于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士而言，澳门似乎有多种途径绕过本应具有的文学习槛。没有越过一定高度的门槛，文学的写作常常被理解得相当容易，也相当随便，这对文学的成就不可能不产生负面影响。在缺少或事实上取消了发表门槛的文学环境之中，文学写作者如果能在较高的艺术定位甚至文化定位上采取一定水平的自我期许姿态和艺术自律的措施，文学创作也同样会出现既活跃又保持相对高水平的局面。但“澳门文学”的自我定位，或者“澳门文学”特定概念的心理暗示，非常有可能让许多初涉文学者轻易地放弃了这样的门槛意识：既然他们的文学写作不过是在澳门这个极其有限的文化世界中一次非常率性的漫游，犹如茶余饭后到议事亭前做一次惬意的散步，为什么自我设置那些门槛？再者，在澳门的文学世界里瞻前顾后、出类拔萃者固然不少，各种各样的随意之作也触目皆是，这就是澳门文学的基本生态和总体情状，任何艺术层次的文学作品都能够有这样的一派自然生态中融入进去，任何的精心构思、悉心打磨，以及任何的苦心孤诣不仅得不到喝彩与赞赏，而且还显得那么背时与傻气。关心澳门和澳门文学的人每每为澳门写作中出现的精彩篇章而兴高采烈，但更有机会领略到的则是遥看草色近却无的感受，一些作品都浑然融入非常一般化的描写和议论之中，显不出什么特色与风致：叙事性的作品常常缺少精彩别致的情节，缺少呼之欲出的人物；抒情性的作品常常只是俗之又俗的情愫，加上人人能及的表达功夫；较多的则是议论性的随笔，理趣淡薄，力道钝滞，甚至语言也寡然乏味。我们没有必

要也没有充足的理由指责这种非常一般化的文学写作，它们毕竟构成了澳门这片文学热土的基本热温，构成了澳门这片虽然不大但毕竟富有生机的文学沃壤上的基础草色。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谁都不愿意以这样的基色和基质代表澳门的文学形象。

这就是说，当提到澳门文学形象的时候，我们的视域很自然地越过了西江水，越过了伶仃洋，越过了南海白云，而摄入了广袤的国土和沸腾的世界。这才是“澳门文学”概念的真谛，是在“澳门学”的意义上阐发“澳门文学”的必由之选。从澳门学的角度来说，澳门文学的形象应该像澳门及其所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样，以一种特别的风致、内涵和魅力出现在世人面前，虽然不是卓然傲立，但较理想的状态应是融入汉语新文学之林而并不逊色。这样的诱人情形在澳门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中都有不俗的体现，不过仍需要澳门文学界付出更大的努力。

这努力的目标之一便是在观念上排除“澳门文学”概念的牵累，让文学写作者勇于走出澳门文学的继承框架，在向世人展示澳门文学形象的意义上营构并展示足以代表澳门的文学成就。在这里，文学写作者的视域及其相应的心态极为关键。如果澳门文学概念仅仅是将人们的视线引进澳门，并局限于澳门，关起门来营造自身的特色，则澳门文学形象的建立就会归于失败，由此造成的牵累可能是这样的尴尬与悖论：如果勉力打造和建构澳门文学形象的“澳门文学”概念，怂恿并鼓励了澳门文学“足不出户”的基色和基质——大部分写作者满足于在澳门写作和为澳门写作，写作心态呈现出的自呈其才、自赏其芳，以及在传统诗文世界中常见的相互酬唱。新文学兴起之初，陈独秀等先驱者竭力否定旧文学传统的便是这小范围相互酬唱的写作习惯和文学交往方式，当时蔑称这样的文学为“酬唱体”。如果强调澳门和“澳门文学”这种小范围、小世界以及小制作的心态，使得我们的当代文学创作重新捡回了“酬唱体”的文学心态——这不仅令人遗憾，而且颇觉悲凉。

“澳门文学”在澳门学总体上的学术定位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澳门文学形象的提出更开启了让人们走出澳门，放眼世界的思路与胸襟，但这一切都要在克服狭义的澳门文学视域，进一步开阔我们的汉语新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视野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否则，它可能就会成为澳门文学写作者自我设限的

理论依赖、不思进取的理论借口、越来越普遍的“酬唱体”写作心态的遁逃渊薮。澳门文学形象的确立有赖于走出单独概念中的澳门文学，而呼唤着在“澳门学”的整体意义上把握它的文化属性。

二、澳门文学的基本生态

澳门文学在整个汉语新文学界具有特定的文学生态意义。而澳门的移民文学家在这一生态中的意义尤为不能忽略。澳门虽然不是一个大都市，或许因为靠着大海的缘故，能以相当的胸襟接纳来自各方的文化与来自各地的文化人士。这是一个在文化上基本不设防的现代城市，文学方面更是如此，因而任何时段的移民文学都能够借此得到一定的发展，并融进澳门文学的矩阵之中。当然这个矩阵是否真的已经形成，这本身就是个学术问题；这个学术问题的解析也还是涉及澳门的文学生态，以及这一生态中必然包含的移民文化与文学因素。

澳门长期以来就是一个以开放性著称的地方。它的被开发和发展都与各种被动的和主动的开放性密切相关。各种向度、各种动因的开放性使得澳门以一种与这个城市规模并不相称的包容气度迎接、吸纳各路移民以及他们所带来的移民文化。然而这种移民文化并不能真正改变澳门地方文化的基础与习惯，唯其如此，澳门移民文化才得以被迅速接纳并生存、发展。

澳门文化的基础与习惯或许表现在对文学职业化的漠视。这使得澳门文学作为一个话题长期被忽略，甚至作为一个概念也使用得非常谨慎。澳门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矩阵，其存在或成形的合法性之所以曾受到一些怀疑，以至于1983年才开始讨论如何建构“澳门文学形象”，是因为人们过于重视文学创作的风格特征和标志性成果。其实，作为一个地域性的文学现象，澳门文学早就形成，并且已经拥有了自身的形象。这个形象可能包含它的“非专业性”（即李观鼎教授为澳门文学批评所概括的“业余性”），一度是没有通常意义上鲜明风格与个性建树的形象。如果人们认为这种没有形象的形象难以被接受，那不妨将之作为澳门文学特有的生态进行考察。

澳门直至今天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业作家，澳门的各路文学家一开始就疏离了文学专家化的路数。汤显祖和贾梅士虽然在不尽相同的传说中住过澳门，相

信他们也绝不是以作家的身份在这里“体验生活”或是驻场写作的角色，就像后来郁达夫等现代文学家路过澳门或在此小住，但都不能算是澳门文学场域的专业作家。即便是到了社会分工更加细密的当代，澳门文学家仍然体现着业余性和非专业化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澳门不重视文学。相反，澳门人对文学的涉足欲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强烈。澳门人的写作活动乃至文化活动主要是通过文学写作展开。据澳门中央图书馆为纪念建馆100周年在1995年举行的《澳门中文作家作品展》统计，由图书馆搜集展览的近十年中文图书共计86种，其中包括针灸类的著作等杂著，并非全是创作性的作品。属于文学性写作的书籍有46种，还不包括类似于写作学的《写作三节棍》（吴国昌、江洵美著，香港青文书屋，1989年）和《论作家的创作体验》（张春昉著，澳门出版社，1993年）在内的语文学习与文学欣赏相结合的作品。由此可见文学性的写作在澳门当时文化运作中的突出地位。

有人说澳门就人口比例以及每平方公里所拥有的诗人量而言，诗人的密度应成为全球最高。《澳门现代诗刊》发刊词指出：“据初步统计，澳门面积目前不到十八平方公里，而几乎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两位写现代诗或新诗的文学‘好事之徒’了，而且其中有一半干脆可以称为澳门诗人。”现在看来，这样的统计还有些保守。澳门的诗人远远不止30或40人。其实，澳门的散文创作也相当热门，作品之密集并不下于诗歌。据澳门文化司署编辑的《澳门中文作家作品展》统计，在文学创作类的46种图书中：

散文集 11部

散文杂集 3部

传记 2部

新诗集 13部

旧诗集 5部

小说 5部

评论集 5部

儿童文学集 2部

这当然是不完全统计，但这样的统计至少可以反映图书出版、发行面上的一个大致比例。从这个比例上看，散文的出版量与诗歌不相上下，纯粹的散文集与新诗集的比例是11：13，如果较为宽泛地理解散文文体，将杂文都计算在内，则散文书籍的数量已超过新诗的创作量。这样的比照和统计对于论述散文与诗歌在澳门文学框架中孰重孰轻也许意义并不很大，此前人们就曾展开过这类没有太多必要的论辩。郑炜明写于1993年的一篇文稿说：“最近有一位澳门文学的研究者在报章、刊物上撰文说澳门文学最有成就的是散文；笔者对此论点未敢苟同。笔者认为，无论从质和量（以已经结集成书的来算）方面看，澳门的现代诗，成就都比散文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只要认可澳门文学中散文与诗歌或者诗歌与散文诗最重要的两个文类，原无须分出彼此的高低来。

散文和诗歌远离文化市场，同时也就远离了职业性运作；这两种文体都更多地表现个人性情，或者更直接地显现个人才情，它们的相对发达正好说明澳门写作者性情化写作的普遍性。这种性情化的写作排斥了市场运作对文学的可能干预，也拒绝了政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硬性介入，保证了写作者在只忠于自己的性情或只为自己的才情服务的写作热情及其独立性。当然，性情化写作的负面影响相当显著，尤其是澳门，那就是人们普遍不追求文学创作的经典性，放弃了文学的轰动效应和显性社会影响的考虑，作品的总体质量难以提高到相当的水平。这是澳门文学在相当长时间内都难以确立自己形象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但是，文学的原生态本来就不是为文学职业者、经典文学家和精英阶层准备的，文学本来应该是广大民众和写作爱好者表达自己性情与才情的文化品类，最远生态的文学往往都是民歌、民谣和民间故事，所有这些原生态作品都不是为进入经典的殿堂而准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文学的生态事实上更接近于体现文学的原生态意义。在这种原生态意义上发展起来的澳门文学，也许不能为汉语文学提供足以令人满意的个体文本，不能在文学经典化运作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灿烂的篇章，但它的标本价值也许更大。它消解了，或者说剥离了附加在文学身上的各种缋绁，在并不巨大的社会性运作中成就了一个几乎是纯文学的格局，而在别的地方，这样的格局也许只是在少数作家身上才能得到有限的呈现，并且很可能不成格局，只是某种意念理性的零星展示。这是澳门文学的基本生

态，也是澳门文学的基本特色。它蕴藏的文化标本意义也许并不下于大三巴等世界文化遗产，只不过它是精神现象，而且是人们很容易忽略的精神现象。

由于这样的生态，文学创作在澳门从来就不是殿堂之上的宝器，而是流寓于民间的习见之物，文学写作的门槛之低乃体现为一种文化的常态。由于出版的相对自由，稍有文字之功的人皆可以在这片狭窄的土地上做起自己的文学之梦。因而，中小学生的作品也可以编辑成文学专集，《小豆芽》等便是明证；至于澳门科技大学学生自己编著的《镜海诗刊》，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续办下去，则已经是相当有水平的诗歌出版物了，但仍属于文学习作的常态结集。

澳门文学的特殊生态虽然造成了文学写作的热门化，造成了相对密集的诗人群以及相当普遍的写作者，但基本上没有人以诗歌为业，靠散文吃饭，文学创作完全是性情的表现，之于写作者的人生乃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副业。与此同时，文学杂志也很少有专门化的定位。1988年韩牧在《澳门新诗的前路》一文中还在谈论：“澳门一向缺乏文艺杂志，纯粹登诗作和诗评论的特刊，也好像没有过。”所述正是如此情形。即便是有一些文学杂志，也更多地带有同人刊物或民办刊物的性质，文学在这里从没有被社会特殊“分工”，没有专门化的招牌。这是澳门文学的基本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这样的生态决定了移民文学与文化的进入及其被接纳乃是一种必然。

三、澳门文学文献整理与编年史

文献整理工作，在文学研究的传统的视野和研究者的印象中，属于古典文学的学术范畴，似乎与新文学关系不大。其实，汉语新文学亦已有了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其外部固然历经内忧外患，动荡离乱，其内部也屡被革故鼎新，世代更替，当事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作品的主动修改和增删更大大增强了新文学文献整理的必要性，加之传播手段日益进化，途径不断发展，文献的整理和在新条件下的合理利用，便成了当务之急。新文学的文献整理工作应包括文学史料以及文学作品的文本搜集、版本校勘、经典考订、目录完善等，与古典文学的文献整理颇相仿佛。不过，随着电子传媒的发展以及普及，新文学的文献整理还包括它的开放性扩展与充实，以及利用途径的拓展与更新等。

中国内地的新文学文献整理以及出版工作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工作与成果积累，台湾的文学界和学术界也致力于此项工作多年，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香港。香港文学的历史梳理固然有黄维梁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在，便是新文学的文献工作，在卢玮銮教授等人的多年努力下，也已经完成了基本资料的整理以及数字化处理，在香港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有关电脑平台上做出了全面而富有系统性的展示，大大便利了香港文学研究者，也标志着香港文学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中华文化圈习惯于将澳门与香港联系起来并举并称，似乎香港文学的文献资料已经有了如此平台，下面就轮到澳门了。在人们的习惯性认知中，澳门的文学文献建设以及其他文化建设工程，似应瞠乎其后，在台湾与香港之后，当然更遑论内地。如果说这样的认知已足以令澳门的有识之士难堪，则许多方面的现实则更加令人不堪，即就新文学文献整理与系统化建设方面而言，其实际情形远远达不到这种认知的水平。

从政治地位、经济影响等方面言之，澳门也许应该安心于这样的一种行政序列，但恰恰从文学和文化建设的角度论之，澳门有足够的理由和条件拒绝这样的一种理所当然、瞠乎其后的观念。澳门丰富的文化历史、复杂的文化构成、特殊的文化地位，以及具有鲜明特色和魅力的文化面貌，决定了它即便是在文学文献建设方面，也可能而且应该从既成的社会政治序列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方翘楚。这一方面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也许是很重要的方面，即需要人们观念的调整。遗憾的是，从新文学文献整理和建设方面而言，澳门几乎处在失语兼失措的状态，不仅没有奋起直追，哪怕是瞠乎香港其后的势头，甚至也没有类似的迹象。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澳门本土文学工作者和学术研究者调整相关观念。

文献整理观念的突破必须仰仗于文学观念的突破。最近有关汉语新文学概念所构成的学术突破有可能帮助人们重新认识澳门新文学的价值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这样亦有助于更新关于建设澳门新文学史料的理念与认知。长期以来，研究界习惯于以国族甚至政治实体为基础，辅之以时代的参数，用来框定一个地域的文学，于是以汉语为载体的新文学便被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或者为了因应这两种文学在观念和研究体制上趋于一体化的时代要求，合并而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又因为习惯认知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加之

研究者涉猎面的局限，往往很难包括“台港澳文学”，再由于国族和地域的人为限制，更无法包括“海外华文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于是，在汉语新文学这一话语范畴，我们习惯于接受的观念显得是那样内涵龃龉且外延含混，或以临时、零散的样态做纷乱、嘈杂的学术呈现。处在这样的学术呈现中，在我们习惯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等明显缺乏学术整合且相互之间夹缠含混的学科概念中，澳门文学由于澳门的行政地位和地域限制，在这样一种学术秩序的表述和安排中必然处于瞠乎其后的地位。

但是如果确立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及相关理念，认定一个民族的文学应该以其基本的外壳——语言形态为主要依据，而不是以国家、地域等空域因素为唯一依据，则澳门文学连同澳门文学文献资料的天然地位就不应理所当然地被限制在必然次于台港的位置，从而心安理得地将所有工作及努力瞠乎别人之后。

这一有利于确立和优化澳门文学和澳门文学文献整理工作的文学观念其实并不难理解。从一个共同的新文学传统，从一种共同的汉语语言的表述系统出发，汉语新文学概念及相应的观念，乃出于对人们面对的所有上述文学现象进行学术审视和整体的概念把握的学术初衷。这一概念表明，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抑或是所谓世界华文文学，既然都是以汉语写作的，区别于传统文言作品的各体新文学作品为对象，可暂且不论在时代属性上是属于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也暂且不论在空域属性上是属于中国本土写作还是海外离散写作，都可以而且应该被整合为“汉语新文学”。澳门的新文学是汉语新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学术定位完全不必依赖于澳门地域的行政地位，而是在汉语新文学传统形成和价值发展中，天然地拥有与各地域新文学同等的机遇——只要有足够的贡献与成就，其价值地位完全不必按照地域序列而沦为末流。

这对于澳门文学的发展，还意味着长远空间的一种期许：按照旧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澳门文学只能附属在台港澳文学之末成为附录，而且台港澳文学的说法已经构成约定俗成的次序，澳门文学无论发展到如何辉煌的程度，都只能在内地之外排在末位；汉语新文学观念消除了这种按照政体格局排位的老套做法，只要是汉语新文学范畴的创作，无论产生于何地，都共同拥有汉语这个平

台，再也不必按照地域排出先后轻重。如果说现在的澳门文学还不能适用于这样的判断，则从台湾文学的发展中却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北京大学谢冕教授、孙玉石教授证实，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台湾诗歌在其先锋性、开创性方面为汉语新文学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而那时候的大陆诗歌则在较低的艺术层次徘徊。这样的历史情形在旧有的学术格局中表述起来相当困难，似乎“中国当代文学”无论在任何时期都是主导的、核心的，而“台湾文学”无论成就多高都只能瞠乎大陆其后。如果引进新文学概念，不分政治地域，只看汉语新文学建设的成就，则很容易理解谢冕教授、孙玉石教授提出来的这种学术现象：汉语新文学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任何地域的汉语写作都应该在汉语文化的平台上平等、公正地看待；在汉语文学表达的内涵、张力和艺术性面前，任何地域优先的考量都会失去市场。

这样的观念调整能在文学文献的整理和运用方面较为迅速地体现出来。澳门文学的总体水平，相较于台湾、香港，自然处在劣势，但并不意味着它在所有方面、在任何时段都体现这样的劣势；特别是澳门文学资料的整理、文献的开掘以及数字化的开发，未必就应该瞠乎其后。当汉语新文学概念冲淡了“政治格局决定论”的影响之后，澳门的文学建设和文化建设更有理由，至少在文学文献整理这一领域，敢于做率先开拓的垂范。

首先，澳门文学发展有着悠久而独特的历史，历史文献的总量虽然未必浩繁，却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即使是新文学领域，其发展演进的历史几乎同步于整个新文学的发展过程，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历史内涵的呈示。就目前澳门新文学的一般资料而言，学术界所能搜集和运用的只是其冰山一角；新文学之于澳门最显著的印迹常常不过是郁达夫的小说《过去》，以及一些现代文学家的澳门行迹，更多更丰富的资料则很少整理和发掘。其实，至少在抗战时期，澳门充任了许多新文学家流落的“集散地”或“避难所”，这一课题很值得研究，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的搜集、整理亟须系统化。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澳门文学在整个汉语新文学界，具有特定的文学生态意义。从一代文化大师梁披云开始，澳门文学家最先疏离了文学专家化的路数。这个地方的文学人士或文学爱好者普遍习惯于将文学当成愉悦性情、展示才情的

本色路数。于是，梁披云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同时花更多的精力写作其他杂文体。澳门后来的文学基本上走的是这种“生态化”的道路，文学写作不再是为了使作者锤炼成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或散文家、戏剧家，而是为了自己的性情和才情，为了自己抒发、讲述和叙说的需要。他们不必依靠有影响力的杂志、报纸和出版社，不必指望通过文学奖的获得或文学史著作的认定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是利用这一充分自由的空间，自由自在地出版自己的作品，有时候仅仅就是用于馈赠亲友。有人说澳门就人口比例以及每平方公里所拥有的诗人量而言，诗人的密度应为全球最高。与此同时，没有一个诗人以诗歌为业，借诗歌吃饭，文学创作完全是性情的表现，之于人生乃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副业。甚至于，文学杂志也很少专门化和专家化，更多地带同人刊物或民办刊物的性质，文学在这里从没有被社会特殊“分工”，没有专门化的招牌。虽然这样的文学总体上成就不是很高，但它所体现的文学生态十分真实、生动且充满活力，某种意义上是汉语新文学在原生态意义上体现得最为具足的区域。对于这方面的文献史料的整理，不仅能体现出相当丰富的文化特质，而且能够为世界文学保存并开发出一套真实、生动且富有活力的文学和文化标本。

概念的调整，当然并不是为了对澳门或别的地域文学进行重新定位，但它可以从观念上促进一切有志者不必处于既成的序列之茧中自缚其身。其实，便是从文学发展的现实而言，也并非澳门文学始终就处于别的地域文学之末。从现象而言，澳门文学界能够在传统文学、现代文学与后现代文学之间成功地搭建互不干涉，甚至有时候还互相通连的文化桥梁，也就是说，热衷于传统诗词的文学家与醉心于后现代诗歌的诗人不仅很少相互攻击，甚至有时候还相互切磋，这样的现象是十分引人入胜的文学和文化奇迹，不仅值得汉语新闻学研究者重视，而且也值得世界文学思潮、流派研究者刮目相看。这样的现象可以说为世界文学思潮的演进和文学流派的交流提供了难得的文学史标本，也是在澳门以外的其他汉语文化地域乃至于世界各地都无法再现的文化和文学和谐景象。从成就而言，至少澳门的现代主义风格的诗歌超过了香港的总体水平，其写作水平和影响力，在汉语新文学世界可以直接与台湾现代派诗歌相媲美。这样的文学史实清楚地表明，澳门文学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须被视为瞠乎其后。

因此，澳门文学的文献整理应该成为重要的学术课题。澳门文学编年史的编撰则是这种整理工作的重要环节。

四、编年史的编务等

《澳门文学编年史》的编撰是澳门基金会于2010年立项的重要研究项目。基金会邀请朱寿桐编制工作计划和研究流程，邀集著名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家古远清教授，著名诗人、长期居住澳门的学者傅天虹教授，以澳门文学研究成果获得第一个博士学位的张建华教授，以及在台港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对澳门文学很感兴趣的梁笑梅教授，四位专家每人负责一个时段，将新文学建设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澳门文学事件逐年、逐月、逐日加以整理，集为四卷，分别是：1920—1949年卷（张建华编撰），1950—1969年卷（古远清编撰），1970—1979年卷（傅天虹编撰），20世纪80年代前卷（梁笑梅编撰）。在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编委会调整三部分工作，将70年代卷分为两卷，由傅天虹、许燕转编撰。80年代前卷在梁笑梅完成部分编撰任务的基础上改由多人多次编撰，朱寿桐总负责。以后的计划是每五年编修一卷，从而建立起较有系统的澳门文学历史资料。

现在，第一期工作告一段落，其中甘苦，修者自知。在澳门做文学研究，可能最艰难的事情就是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诚如上文指出，澳门的文学缺少职业化的历史与行政建制，甚至缺少相应的文化建制，文学创作甚至文学出版都长期处于一种随产随散的状态，越是久远的文学资料，其散佚越是严重。更重要的是，澳门历史上喜爱文学者甚众，但唯其秉持爱好心态，未能以专业或者职业对待，因而文献的保存和开发，在相当长时间内都相当欠缺。例如，在澳门文学历史上应该占有相当地位的《红豆》杂志，当时就以油印的方式行世了事，这些都为后来的搜集和保存工作带来了困难。所幸《红豆》全本已经重印，但为尊重历史和治史习惯计，油印刊物能否直接入史，尚在犹豫中。加之，由于在更多的历史阶段澳门文学形不成气候，其发展处在断断续续之间，给资料的积累和保存带来很大麻烦。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的研究团队仍然克服重重困难，在浩如烟海的旧报纸和其他文献堆里，披沙拣金般地寻找各个时代的文学资料线索。幸亏中华总商会保存有较为完备的《澳门日报》等报刊资料，多少使得我们的整理工作有了基础